《万树园赐宴图》相关问题研究

隋晓霖

内容提要　乾隆时期，位于承德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为接待和宴请少数民族王公及外国使臣的重要场所。《万树园赐宴图》是一幅纪实题材的宫廷绘画，记录了乾隆皇帝在此赐宴率部归附的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的重要历史事件。本文以此图为对象，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图中油画肖像的少数民族人物身份进行补说，并对此图的创作背景、绘制目的和政治意义进行论述。

关键词　乾隆帝　万树园赐宴图　杜尔伯特　三车凌

一　引言

万树园位于承德避暑山庄东北部，建于乾隆六年(1741)，虽以园名，但不施土木，园内搭建大小不同的蒙古包。乾隆十九年(1754)万树园被定为筵宴少数民族王公的场所，这既增强了万树园的功能，也提升了万树园的重要性。据统计，自乾隆十九年始，乾隆皇帝在万树园中接见蒙、回、藏等各民族上层贵族和宗教领袖达九次‹1›，还多次会见、赐宴东南亚及欧洲诸国的使节，使万树园逐渐演变成重要的外交场所。

目前，学界以万树园为研究对象的文章，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在民族问题的大背景下，以避暑山庄的政治意义为基点，探讨乾隆皇帝处理蒙古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兼及万树园的相关研究。如王音璇《浅谈避暑山庄万树园及其独特的政治作用》‹2›，分析了乾隆频繁在万树园接见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李建红、闫春生编著的《一张图表看懂避暑山庄》‹3›，系统介绍了避暑山庄的布局功用、历史背景及重要史实，分析了万树园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功用。第二类是以三车凌等杜尔伯特部首领归降事件为线索，谈及万树园赐宴活动，并论及乾隆的十全武功。如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4›、马雅

‹1›　李建红、闫春生：《一张图表看懂避暑山庄》，中华书局，2017年。

‹2›　王音璇：《浅谈避暑山庄万树园及其独特的政治作用》，《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3›　前揭李建红、闫春生主编《一张图表看懂避暑山庄》。

‹4›　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

贞《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1]等，采用图史结合的叙述方式，深入探讨清帝国和边疆民族的关系，以及万树园赐宴活动的政治意义。

第三类是对表现乾隆朝万树园赐宴活动的纪实题材宫廷绘画的研究。如杨伯达《〈万树园赐宴图〉考析》[2]，较全面地介绍此画的政治内容和艺术水平。通过对此画的绘制时间、艺术风格、描绘对象、装潢形式和流传经过的详细考订，确认此画是经乾隆皇帝旨命授意，由郎世宁指导、王致诚担任主笔，中西画家通力合作完成，表现的是乾隆十九年五月甲午（十六日）乾隆皇帝在万树园赐宴车凌亲王等杜尔伯特部大小官员的真实场面。而陆续发现的参与万树园筵宴的蒙古族部落首领油画肖像，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聂崇正《西柏林观清宫廷画记》，介绍了西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收藏的十五幅单张油画肖像，指出“前八幅画的是厄鲁特蒙古族的部落首领，展览的文字说明中，定为乾隆时在清宫中供职的法国画家王致诚所作”，“都是画家奉命为创作大型纪实绘画收集的素材”[3]。聂先生《再说清宫油画半身像》进一步指出，这些颇类速写的油画肖像，“带有稿本的性质”[4]，均是从中国流散出去的清宫旧作。单国强《明清宫廷肖像画》[5]，则是将《万树园赐宴图》放在清代纪实画中的肖像类加以介绍。石涵《乾隆朝蒙古人相关图像研究》[6]侧重蒙古人的特征，涉及《万树园赐宴图》等作品中的蒙古人形象。李一白《从〈万树园赐宴图〉看郎世宁新体》[7]重点讨论画法技巧。

即便有上述研究，笔者以为，对《万树园赐宴图》的论述仍然有空间。本文以《万树园赐宴图》和陆续发现的参与筵宴的蒙古族部落首领油画肖像为线索，结合文字史料，尝试探讨图画创作背景，分析图画绘制的目的与政治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二 《万树园赐宴图》的创作背景和绘制者

《万树园赐宴图》〔图一〕，绢本，设色，纵221.2厘米，横419.6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画上不见钤印，左下角有墨书“乾隆二十年……敕恭绘……”两行八字残款。四边裱蓝装，背裱高丽纸。

作品描绘了乾隆十九年夏，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内举行筵宴的场景，赐宴对象为扈从王公大臣、满洲亲王贝勒、蒙古王公台吉，入觐者有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亲王车凌（又称策凌）、郡王车凌乌

‹1› 马雅贞：《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2› 杨伯达：《〈万树园赐宴图〉考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4期。

‹3› 聂崇正：《西柏林观清宫廷画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

‹4› 聂崇正：《再说清宫油画半身像》，《紫禁城》2013年第3期。

‹5› 单国强：《明清宫廷肖像画》，《明清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6› 石涵：《乾隆朝蒙古人相关图像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7› 李一白：《从〈万树园赐宴图〉看郎世宁新体》，《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图一**〕《**万树园赐宴图**》(**局部**)
横419.6厘米　纵221.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巴什(又称策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又称策凌孟克或车凌蒙克)等各部落归诚者，以及四十九旗扎萨克并青海诸部王公台吉等[1]。此图场面壮观，人物众多，中西技法自然交融，画中主要人物肖像应是法国画家王致诚亲临现场观察绘制[2]。画面由黄帐将空间分隔为内外两部分。黄帐内，侍卫等距站立。左下方近景，由十六个内官抬着的轻步舆上，乾隆皇帝正襟危坐，在扈从侍卫和文臣武将的簇拥下，由西路缓缓进入筵宴场地，王公贵族和入觐的少数民族人士分为八排，面朝皇帝跪地迎候。场地中央，置有一座大型蒙古包式御幄，内铺莲花纹地毯，设御座，两边摆有四排共十六张宴桌。御幄外东西两侧，设有中和韶乐，演奏者穿团花红袍立于周围。御幄前方两侧，架设两座蒙古包式小幄，门外亦有侍卫站

‹1›　《钦定热河志》卷一五“十九年五月甲申，御万树园，赐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都尔伯特台吉等宴”。《钦定热河志》卷二三《宴都尔伯特亲王策凌郡王策凌乌巴什等于万树园诗以纪事》“时四十九旗扎萨克并青海诸部王公台吉毕集行在，皆令入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以下版本相同，不另注明)。

‹2›　乾隆十九年，如意馆“七月二十三日，副领催六十一持来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为十九年五月初七日承恩公德奉旨带领西洋人王致诚往热河画油画十二幅，钦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0册，页377，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版本相同，不另注明)。

立。西侧小幄前，一排少数民族人士跪地迎候。御幄前方左右，各有两排宴桌，每排六桌，共二十四桌，左右各两排相对跪迎的队伍中，有黄教首领和文武百官。东边搭有庑殿顶垂幔帐篷，内设十四桌，上置丝、瓷、玉、玻璃等，是赏赐给“三车凌”等人的贵重品；画面前方，置有用木架搭成的戏台等。黄帐外，是浓郁的树丛，右上角为永佑寺塔和乐成阁，左上角为山庄山区景色，左边设有三座小连帐，杂役等人正紧张忙碌地准备筵席的膳食。

自清朝开国以来，西北边境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不仅让连续几代清朝统治者寝食不安，也给广大厄鲁特各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乾隆十八年(1753)冬，厄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首领“三车凌”(即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统称杜尔伯特台吉)决定摆脱准噶尔，率部一万多人东迁归附清朝政府‹1›。这一行动，受到清政府极大的重视和欢迎。

乾隆十九年五月十三日至二十二日，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归诚的“三车凌”，分别封杜尔伯特部上层人物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的称号和爵位，赏赐金、银、玉、瓷、绢帛等工艺品、丝织品，并在万树园进行了长达十天的隆重觐见、宴请和观火戏活动‹2›。《万树园赐宴图》就是在赐宴之后绘制的，成画于乾隆二十年，绘毕陈设在避暑山庄的卷阿胜境殿。

法国画家王致诚曾被派遣到现场绘制“三车凌”等油画肖像十二幅‹3›。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九日，在进击准噶尔部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之时，乾隆皇帝命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艾启蒙(Jgnatius Sickeltart)三人为卷阿胜境东西山墙画御容筵宴图大画二张‹4›，其中就有根据这一历史事件创作的《万树园赐宴图》。

《万树园赐宴图》因画上书款处绢脱落未能留下作者信息。但通过画风和文献记载，可知是经乾隆皇帝旨命授意，由中西画家通力合作完成。图中的山峰树木、蒙古包式御幄等采用中国传统画法，主要人物肖像则大多采用明暗渲染等西洋画法，在绘画风格和技法上，融合了中西画法的各种技巧，使图画有别于以往的宫廷绘画，营造出深远开阔的意境，具有很强的历史真实感。

三 《万树园赐宴图》少数民族人物肖像补说

《万树园赐宴图》属于纪实性作品，较真实地记录了乾隆皇帝与王公贵族、“三车凌”等蒙古大小官员宴飨同乐的场景，画中的主要少数民族人物肖像，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参照。

‹1›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四，页819—8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乾隆朝》卷一三，页24—42，书同文古籍数据库电子版。

‹3›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乾隆十九年，如意馆“七月二十三日，副领催六十一持来员外郎郎正培、催总德魁押帖一件，内开为十九年五月初七日承恩公德保领西洋人王致诚往热河画油画十二幅，钦此”。

‹4› 前揭《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1册，乾隆二十年，如意馆“五月初九日，员外郎郎正培奉旨：热河卷阿胜境东西山墙着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画赐宴图大画二幅，钦此。于本年七月初十日，员外郎白世秀送往热河贴讫”。

从画面布局看，左下方近景，面向乾隆皇帝跪地迎候的八排人物，为画面的重点部分。从这八排人物的面相和服饰上看，前两排身着清制冠服的人物，显然为朝廷王公贵族；后六排中，第三排身着清制冠服的十五人和第四至八排身着少数民族衣冠的人物，虽然服饰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左耳都戴有金银环(有的金色已脱落不甚明晰)‹1›，且脸宽、颧骨高、面色黝黑。杨伯达先生经过考证，确认这六排具有典型少数民族特征的群体，就是此次赐宴的重要人物——杜尔伯特部"三车凌"等归附人士。杨伯达先生揭示了其中一些人物的重要信息，但仍有部分内容需要结合史料加以丰富〔图二〕。

〔图二〕《万树园赐宴图》少数民族形象

〔图三〕《万树园赐宴图》(局部)杜尔伯特部随从人员

首先，我们可以对照相关的文字来印证这六排少数民族人物的族群归属。据《皇清职贡图》记载伊犁等处厄鲁特部落服饰，"其头目谓之台吉，戴红缨高顶平边毡帽，左耳饰以珠环，锦衣锦带，腰插小刀，佩椀巾，穿红牛革鞮。……台吉之下各置宰桑，以辖民人。……男戴红缨高顶卷边皮帽，左耳亦饰珠环等，衣长领衣或以锦绣或以纻丝、毾㲪，腰插小刀佩椀巾，穿红牛革鞮"‹2›。图中第四至八排人物，有的头戴红缨高顶开口平边毡帽，有的头戴圆沿尖顶红缨毡帽，左耳戴金银环，与厄鲁特部落通行的衣冠带履一致，说明这是参与筵宴并受封赏的厄鲁特杜尔伯特部台吉、管旗章京、宰桑及随从人员〔图三〕‹3›。

乾隆皇帝御制诗《宴都尔伯特亲王策凌郡王策凌乌巴什等于万树园诗以纪事》中写道："镶鐋自可随方俗，冠服同教式本朝"，在这句后面，特别注释"策凌等入觐后，即赉以冠服，俱从本朝之制"‹4›。"镶

‹1› 前揭杨伯达《〈万树园赐宴图〉考析》。

‹2› (清)傅恒编：《皇清职贡图》页182，辽沈书社，1991年。

‹3›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六四，页1022，乾隆十九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86年。

‹4› 前揭《钦定热河志》卷二三《宴都尔伯特亲王策凌郡王策凌乌巴什等于万树园诗以纪事》，页337。

鐫”，即金银大耳环[1]，此处专指厄鲁特部落人士佩戴的“绥克”。《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服物一》记准噶尔部《被服之具》称“绥克即环也，金银为之，以坠耳饰以珠，男妇皆用之”[2]。图中第三排十五人，虽然保留了左耳戴金银环的少数民族习俗，但却身着清制冠服，与乾隆皇帝御制诗中的记载可相互印证，说明这是参与筵宴并受封赏的厄鲁特杜尔伯特部高级官员，此次入觐的关键人物“三车凌”等应在其中。

其次，我们可以对照相关文字材料，印证第三排的人物身份。据文献记载，此次受封并赐冠服的的厄鲁特杜尔伯特部高级官员有十三人。乾隆十九年五月庚寅（十二日），乾隆皇帝驻跸避暑山庄。都尔伯特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等于道旁跪迎圣驾。辛卯（十三日），乾隆皇帝御澹泊敬诚殿受朝，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等，行礼如仪。诏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塞卜腾（又称色布腾）为贝勒，孟克特穆尔（蒙克特穆尔）、班殊尔（班珠尔）、根敦为贝子，玛什巴图、刚、巴图孟克为公，达什敦多卜（达什敦多克）、恭沙喇（恭锡喇）、巴尔为头等台吉，均授为扎萨克，并赐冠服。壬辰（十四日），上御延熏山馆，赐车凌等宴。甲午（十六日），上御万树园，赐车凌等及准噶尔来使敦多克等宴。乙未（十七日），复御万树园，赐宴、赐观火戏。丙申至戊戌（十八至二十日），亦如之。己亥（二十一日），复赐车凌等宴。庚子（二十二日），亦如之[3]。这十三人是否全部入觐避暑山庄，参加了此次万树园的筵宴活动呢？

从画面风格看，第三排这十五人中，右起前十人的面相少数民族特征鲜明，年龄、特点的表现比较具体，色彩明暗凸凹，具有西方油画肖像效果；而后五人的面相，显然是中国传统画法。杨伯达经过考证，认为其中第一至第七人分别是“三车凌”及孟克特穆尔、刚、巴图孟克、玛什巴图；第八至第十五人可能是受封一等台吉之下的准部官员。但该文也就此提出了疑问，为什么画家少画了贝勒、贝子共三人，而把册封为公的三人则毫无遗漏地全部画上？杨伯达认为，“这可能是乾隆皇帝授意的。究其原因，如今很难理解。因没有资料不便作任何推测，留待今后研究”[4]。上述十位少数民族人物的身份是否可以确认，疑问是否可以得到解释，本文将对照相关文献再作考察。

《钦定大清会典图》卷六二记载，“亲王补服，绣五爪金龙四团，前后正龙，两肩行龙，色用石青，凡补服色皆如之。郡王补服，绣五爪行龙四团，前后两肩各一。贝勒补服，绣四爪正蟒二团，前后各一。贝子补服，绣四爪行蟒二团，前后各一。镇国公补服，绣四爪正蟒二方，前后各一”[5]。如前所述，乾隆十九年五月，“三车凌”均入觐避暑山庄，分别诏封扎萨克和硕亲王，扎萨克多罗郡王，扎萨克多罗

‹1› 《后汉书·文苑传上·杜笃》：“若夫文身鼻饮缓耳之主，椎结左衽鏤鐫之君。”李贤注：“《山海经》曰：‘神武罗穿耳以鏤。’郭璞注云：‘金银器之名，未详形制。’《埤苍》曰：‘鐫，锯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宝等，此并谓夷狄之君长也。”

‹2›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四一《服物一·准噶尔部》，页78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 前揭《钦定热河志》卷二三《徕远第三》，页338—339。

‹4› 前揭杨伯达《〈万树园赐宴图〉考析》。

‹5›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图》卷六二《冠服六》，书同文古籍数据库电子版。

贝勒，且身着清制冠服，参加了万树园的筵宴活动‹1›。杨伯达先生认为，按照受封的爵位和补服纹样，右首第一人，身着正龙四团补服，应是车凌亲王；第二人，身着行龙四团补服，应是车凌乌巴什郡王。笔者同意这一观点。据《平定准噶尔方略》记载，乾隆十八年冬“三车凌”归附时，朝廷即“询知策凌年五十六岁，策凌乌巴什年二十五岁，又有族叔策凌孟克……”‹2›。

对比聂崇正先生《王致诚的油画作品》‹3›中公布的“都尔伯特汗策凌”肖像画‹4›，其面相、年龄特征与《万树园赐宴图》第三排右首第一人相符〔图四〕。受封贝勒有二人，即车凌孟克和塞卜腾。而图画中仅有一人。杨伯达先生认为，右首“第三人身穿正龙二团补服，应是车凌孟克贝勒”，这是符合“三车凌”归服史实的‹5›。但将其定为车凌孟克而不是塞卜腾，仅仅是推断，尚缺少史料的支撑。画家为什么少画了塞卜腾？查看《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二‹6›，即可找到答案。

〔图四〕都尔伯特汗车凌像
纵70厘米　横55厘米
德国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藏

〔图五〕从右至左依次为：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根敦

乾隆十九年夏四月庚辰朔，皇帝“命新降台吉塞卜腾留军前办事，不必前赴热河。上谕军机大臣曰，来降台吉策凌等一百六十余人，各求前赴热河瞻仰朕躬。但此内有台吉塞卜腾，现在军营办理招服乌梁海事。台吉塞卜腾，人明白有材，具朕早知之。着于今年暂留军营办事，令在参赞上行走，俟明年朕巡幸木兰之时，再行前赴瞻仰。至策凌、策凌乌巴什等，遵旨于所属人内选兵二百名，令宰桑和通玛什等率领，俱交与塞卜腾带赴军营调遣”。《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色布腾列传》中亦有相同记载‹7›。可知，塞卜腾因接受朝廷重任，没有前往避暑山庄入觐。因此，身着正蟒二团补服的右首第三人，应是车凌孟克贝勒无疑〔图五〕。

‹1›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五、九六，页830、833、835。

‹2›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页13，《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 聂崇正：《王致诚的油画作品》，《紫禁城》1989年第3期，页37。

‹4›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五，传第七十九《扎萨克特古斯库鲁克达赖汗车凌列传》，页830，“（乾隆）二十年，诏授参赞大臣，从西路军征达瓦齐。……寻率新降台吉入觐，饮至，诏封杜尔伯特汗，赐特古斯库鲁克达赖号，授左翼盟长，赏银三千遣归牧”。可知，亲王车凌，又被封杜尔伯特汗。

‹5› 杨伯达《〈万树园赐宴图〉考析》原文：“第三人身穿正龙二团补服……”中“正龙二团补服”有误，经笔者比对，应为“正蟒二团补服”。

‹6› 前揭《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二，页27，“命新降台吉塞不腾留军前办事，不必前往热河”。

‹7›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六《传第八十一·郡王品级扎萨克多罗贝勒色布腾列传》。

受封贝子有三人，即孟克特穆尔、班殊尔、根敦。而图画中仅有一人。杨伯达先生认为，右首“第四人身穿行龙二团补服，应是孟克特穆尔贝子”[1]，但同时指出“是否合宜，尚待证实”。我们可以对照相关文字和图片，进行辨析。

孟克特穆尔，史书无传，事迹见其弟《扎萨克一等台吉额布根列传》[2]。据载，额布根为车凌族子，其兄弟五人，孟克特穆尔为长。乾隆十八年，额布根昆弟从“三车凌”来归。“十九年，额布根入觐，孟克特穆尔留视牧。上以孟克特穆尔为其昆弟长，诏封扎萨克固山贝子。额布根将归牧，孟克特穆尔从车凌蒙克子巴朗叛遁。……二十年……孟克特穆尔为北路军所擒。上恶其首附叛，且词谲，诏论死如巴朗罪”。由此可知，此次跟随“三车凌”入觐的是孟克特穆尔的弟弟额布根，孟克特穆尔则被留在驻地，但仍然被诏封为贝子。当额布根即将返回时，孟克特穆尔与巴朗叛遁事发，画面中自然不可能呈现其形象。后世著述，亦因孟克特穆尔“以叛诛，故不立传”。因此，将上述右首第四人身穿行蟒二团补服者，定为孟克特穆尔贝子，是不合宜的。

班殊尔，《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七有传[3]。据载，班殊尔为车凌族子，乾隆十八年从“三车凌”来归，十九年诏封扎萨克固山贝子。“既而，所部诸台吉，咸从大军征达瓦齐。……班珠尔（班殊尔）以疾不获从。寻卒，无嗣”[4]。根敦，据载为车凌族弟，《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七有传[5]。乾隆十八年，根敦携诸弟及属众从“三车凌”来归，十九年，诏封扎萨克固山贝子。

班殊尔、根敦是否跟随“三车凌”入觐，并参加万树园的筵宴活动，史传没有明确记载。但乾隆十九年五月王致诚在热河所画的“都尔伯特扎萨克固山贝子根敦”肖像画[6]，可证根敦应该跟随入觐，并参加此次万树园的筵宴活动。又据史传，班殊尔为车凌族子，根敦为车凌族弟，根敦应该比图中二十五岁的车凌乌巴什（车凌从子）年长，其面相特征及年龄，亦与右首第四人相符。因此，身着行蟒二团补服的右首第四人，应该是根敦贝子〔图六〕。

图中右首第五、六、七人中，身着正蟒二方补服的有三人，按照受封的爵位和补服纹样，与史传记载的三位辅国公，刚、玛什巴图和巴图蒙克相符。此三人《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均有传。据载，三人皆于乾隆十八年从“三车凌”来归，十九年诏封扎萨克辅国公，玛什巴图为车凌族弟[7]；巴图蒙克为车

‹1› 前揭杨伯达《〈万树园赐宴图〉考析》原文：“第四人身穿行龙二团补服……”中“行龙二团补服”有误。经笔者比对，应为“行蟒二团补服”。

‹2›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八《传第八十二・扎萨克一等台吉额布根列传》，页845。

‹3›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七《传第八十一・扎萨克固山贝子班珠尔列传》，页841。

‹4›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七《传第八十一・扎萨克固山贝子班珠尔列传》，页841。

‹5›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七《传第八十一・扎萨克固山贝子根敦列传》，页842。

‹6› 前揭聂崇正《王致诚的油画作品》，页37。

‹7›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七《传第八十一・扎萨克固山贝子玛什巴图列传》，页840。

〔图六〕都尔伯特扎萨克固山贝子根敦像
纵70厘米　横55厘米
德国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藏

〔图七〕都尔伯特公巴图蒙克像
纵70厘米　横55厘米
德国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藏

〔图八〕从右至左依次为：刚、玛什巴图、巴图蒙克

凌从叔父[1]；刚为车凌族弟[2]；其中仅有玛什巴图有入觐并参加万树园筵宴活动的记载。而乾隆十九年五月王致诚所画的[3]“都尔伯特公巴图蒙克”肖像画〔图七〕，可证明巴图蒙克亦入觐，并参加万树园的筵宴活动。刚的年龄亦符合图中右首第五人，第六人应为玛什巴图，第七人应为巴图蒙克〔图八〕。

〔图九〕从右至左依次为：达什敦多布、恭沙喇、巴尔

图中右首第八、九、十位为身着麒麟二方补服的一品官，按照受封的爵位和补服纹样，与史传记载授扎萨克一等台吉爵三，曰达什敦多布、曰恭沙喇、曰巴尔相符。对此，杨伯达先生没有作具体比附。此三人《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均有传。据载，达什敦多克为车凌族叔父[4]；恭沙喇为车凌族弟[5]；巴尔为车凌族子[6]。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这三人是否跟随入觐，并参加此次万树园的筵宴活动，但是根据上述文字记载，三人年龄亦符合图中人物，故推测第八、九、十位应为达什敦多布、恭沙喇、巴尔〔图九〕。

综上所述，第三排前十人依次应为亲王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贝子根敦，辅国公刚、玛什巴图、巴图蒙克，扎萨克一等台吉达什敦多布、恭沙喇、巴尔。我们可以确信，此图“是按弘历旨命，由王致诚将在承德避暑山庄所画杜尔伯特部台吉‘三车凌’等十人油画肖像搬上了画幅。其后五人可

‹1›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七《传第八十一・扎萨克辅国公巴图蒙克列传》，页840。

‹2›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八《传第八十二・扎萨克辅国公刚列传》，页843。

‹3› 前揭聂崇正《王致诚的油画作品》，页37。

‹4›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八《传第八十二・扎萨克一等台吉达什敦多克列传》，页844。

‹5›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八《传第八十二・扎萨克一等台吉恭锡喇列传》，页844。

‹6›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八《传第八十二・扎萨克一等台吉巴尔列传》，页846。

能因无写生可循，便由画院里的中国‘画画人’按照记忆绘成，所以一望而知与前十人不同”[1]。此图所表现的，确系乾隆十九年五月甲午（十六日），乾隆皇帝于万树园赐“三车凌”等杜尔伯特部归附官员筵宴前的真实场面。

四 《万树园赐宴图》绘制的目的与政治意义

清代的宫廷绘画，在康熙、雍正至乾隆朝逐步形成了不同于前代的艺术特点。这一时期，国力的雄厚为宫廷绘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绘画的组织机构日臻完善[2]。大量欧洲传教士画家供职于宫廷，他们将欧洲特有的绘画技法授予宫廷画家，创立了中西合璧的独特画风。清代宫廷绘画的创作宗旨，是更全面充分地发挥绘画为皇室服务的功能。其创作题材之一，就是创作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实画。

《万树园赐宴图》的绘制，具有表示政治权力的深层涵义。赐宴是皇帝维护、巩固政权的手段之一。筵宴作为朝觐礼制的一部分，具有宣扬统治权正当性的作用。此图筵宴场景规范而隆重，以乾隆皇帝进入场地为聚焦点，中央设御座与御宴桌，御座前左右设入宴王公大臣等宴桌，入宴的少数民族人士或着清制冠服或着本民族服饰位列其后，跪迎身着吉服乘舆的皇帝莅宴。赐宴场面充分彰显了乾隆皇帝的身份尊贵，以及少数民族宾客的心悦臣服，既凸显了帝王的威严，又展示国家的强盛和皇恩浩荡，充分表现了清朝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关系。

《万树园赐宴图》的绘制，具有以图画宣传武功的目的。乾隆朝时，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的矛盾日益尖锐，西北边疆“准噶尔内乱相寻，诸部离贰稔恶已满”[3]。乾隆皇帝在安置归附清廷的杜尔伯特部首领“三车凌”等人时，就做好了进击准噶尔的准备，“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4]，并以此作为“经理西陲之始”[5]。乾隆二十年二月，清军在格登鄂拉大败达瓦齐，取得了平准战役的重大胜利。乾隆皇帝得知消息，于二十年夏五月乙未命凯旋将军及新降台吉等于七月赴热河避暑山庄入觐[6]。同时，着郎世宁、王致诚绘制《万树园赐宴图》，并“于本年七月初十日，员外郎白世秀送往热河贴讫”。画中对乾隆的描绘，具有树立帝国统治者的权威，达到宣告战勋的目的〔图十〕。

‹1› 前揭杨伯达《〈万树园赐宴图〉考析》。

‹2› 杨伯达：《清乾隆朝画院沿革》，《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杨伯达：《清代画院观》，《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3期。

‹3› 前揭《钦定热河志》卷二三《徕远第三》按语，页339。

‹4› 前揭《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六四，乾隆十九年五月上旬，页1018－1019。

‹5› 前揭《钦定热河志》卷二三《徕远第三》按语，页339。

‹6› 前揭《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一三，“乾隆二十年夏五月乙未”条，页203。

〔图十〕《万树院赐宴图》局部

《万树园赐宴图》的绘制，具有以图画记录人物、表彰功绩的目的。画幅上以肖像呈现的十位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高级官员于乾隆十九年五月均赴万树园入觐，并参加筵宴活动。紧接着，在进击准噶尔的战争中，他们率领“所部诸台吉，咸从大军征达瓦齐，或隶萨拉尔队称西路哨探军，或隶阿睦尔撒纳队称北路哨探军”。据载，乾隆二十年，诏授车凌“参赞大臣，从西路军征达瓦齐。车凌等闻命，自牧所驰抵军……遣佐领蒙克从侍卫塔齐图，檄达瓦齐速降……寻率新降台吉入觐，饮至，诏封杜尔伯特汗，赐特古斯库鲁克达赖号，授左翼盟长，赏银三千遣归牧”。车凌乌巴什“诏授参赞大臣，从西路军征达瓦齐”。车凌蒙克“诏授参赞大臣，从西路军征达瓦齐”。根敦、刚、玛什巴图、巴图蒙克、达什敦多布、恭沙喇、巴尔均“从西路军征达瓦齐……达瓦齐就擒，军旋。玛什巴图以功晋贝子”[1]。“三车凌”等杜尔伯特部众首领在进剿达瓦齐的过程中英勇善战、表现积极，带领部族击退叛军，成功擒获达瓦齐，为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统一西北边疆地区立下汗马功劳。乾隆二十年五月初九日，在进击准噶尔部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之时，乾隆皇帝下旨命绘制此图，并用油画的技法为这十人刻画肖像，给予特殊待遇[2]，不仅是记录杜尔伯特部的归附，更是表彰他们对清廷的忠诚，和作战的功绩。正如史传按语所记，“至于额鲁特诸部，自策凌等降附后，闻风纳款，率属偕徕厥后。若绰罗斯、和硕特、辉特等部，成以叛乱翦灭。惟都尔伯特部忠谨，独存列爵，编旗永为臣仆”[3]。

‹1› 前揭《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九六至九八，页835—846。

‹2› 前揭《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七六，页1147，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上记载：“皇上怜念尔等投诚，施恩画像。现在图画车凌等像，俟尔等回去之便，令讷默库带往，赏给伊等，传之子孙。”从文献上看这些画像是皇上的恩赐，对车凌等来说是一种荣誉。

‹3› 前揭《钦定热河志》卷二三《徕远第三》按语，页339。

综上所述，《万树园赐宴图》是一幅纪实题材的宫廷绘画。绘制的场景为有史可查的皇家大型赐宴活动，画中众多人物和绘制者均亲身参与了纪实事件。绘制者遵从乾隆皇帝的旨命，以写实的手法描绘赐宴的盛况，用中西合璧的技法刻画主要人物的肖像。此图的创作旨在利用宫廷绘画的文化形式，记录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借由展示万树园赐宴的功能，宣扬清廷统治的正当性。既凸显了乾隆皇帝的威严，又表现了乾隆皇帝对少数民族归服清王朝的极度重视，也承载了宣扬盛世武功的作用。乾隆皇帝每次在万树园筵宴外藩，皆会留下御制诗文纪念，如《至避暑山庄日都尔伯特台吉策凌等接见》、《宴都尔伯特亲王策凌郡王策凌乌巴什等于万树园诗以纪事》等‹1›，从中可以看出他强调筵宴为“我朝祖制相传，联情中外，所当万年法守”‹2›，并认为其具有“圣朝柔远之仁”的成效‹3›。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研究室］

（责任编辑：盛　洁）

‹1› 前揭《钦定热河志》卷二三《徠远第三》，《御制诗》，页336。

‹2› 《清代御制诗文全集》，《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三五，武帐一首。

‹3› 前揭《钦定热河志》卷二三《徠远第三》，页339，按语“斯又圣朝柔远之仁，所由威服与德怀，各得其道矣”。